

光晕的消散：“对抗式解码”与时尚街拍的兴起

刘娜

酒泉艺术职业高级中学 甘肃酒泉 735000

摘要：时尚街拍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产品受到学界关注，不同学者将其视作消费社会、文化工业和泛娱乐现象的符号进行批判。但要解释时尚街拍在都市蓬勃发展的原因，必须还原大众的社会心理因素，避免忽视“沉默的多数”。对此，文章采用视觉文化分析的视角读解时尚街拍兴起的深层动因：一方面，伴随着对“有闲阶级”消费品味的抵抗，时尚的阐释权在不同阶级间发生流动，街拍开始萌芽；另一方面，展演在时尚街拍中的女性身体构成了两性审美趣味博弈的场域，表征着女性身体的文化解放，街拍至此兴起。然而，大众的抵抗在解构既有时尚神话后迅速被资本收编，一种新的时尚神话再度降临，自由的光晕随之消散。

关键词：时尚街拍；时尚传播；视觉文化

一、引言

追逐“时尚”作为一个惯常的社会心理，弥散于人类历史和现实，无处不在。近年来，“时尚”逐渐走进传播研究的殿堂，“时尚传播”开始作为一个融合哲学、艺术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而存在。^[1]而“时尚街拍”作为时尚传播领域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从“消费主义”的视角切入解释“时尚街拍”兴起的原因，认为“街拍”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景观”，其背后隐藏着“视觉消费”对人民大众的支配与操纵；^[2]其发展则依赖于媒介环境的变迁。^[3]同时，亦有学者从伦理的维度分析“街拍”导致的不良社会影响，而受众对身体与服饰的盲目尊崇和对感官的过度重视，则可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弊病，值得反思。^[4]

综述学界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学者在分析“街拍”兴起的原因时，多着眼于资本集团对大众的支配和操纵，即生产出光怪陆离的商品以作为“时尚”和“品味”的符号供大众消费，并宣扬这正是大众努力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不断制造新的欲望，使大众身陷符号消费的漩涡，无处可逃。因此，才会有学者将街拍视为一种偏离于主流的“亚文化”，批判大众对感官的重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研究沿袭德波（Guy Debord）“景观社会”理论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理论，深刻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对人的“异化”，从此角度切入分析“街拍”的兴起极富启示性。但

值得商榷的是，在此逻辑中受众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其主体性和能动性荡然无存。事实上，在走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主流”传播学者即在对“皮下注射论”等传播效果理论的反思中，扬弃了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观”，传播效果的达成，恰是受众基于某种欲求展开信息接触，并使这一欲求得到满足的过程。^[5]与此同时，上述将“街拍”视为“奇观”和“亚文化”的研究文章，虽借用了霍尔（Stuart Hall）的“亚文化”概念，却忘记了“对抗式解码”作为霍尔“编码·解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恰凸显了受众解读文本时的主体性，受众绝非是沉默而毫无能动性的社会沙粒。

因此，上述研究的分析虽精彩，但忽视受众的文化解读却恐有将问题简单化之虞，无法揭示“时尚街拍”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兴起并不断发展的真正动因。正如霍尔所言“大众传播的编码与解码，本质是语义空间的文化争斗，在话语里蕴含着权力的对抗”^[6]。诚然，不同社会阶层关于“时尚”的认知最终达妥协，但这一妥协的过程在既是受众反抗的成果，也是其意志被巧妙收编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复杂的博弈和暧昧的争斗。只有通过“街拍”背后的社会心理和视觉文化的分析，正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才能真正还原“街拍”兴起的动因，进而丰富我们对时尚传播诸问题的思考。

二、视觉平权：时尚阐释权的流动

“街拍”正成为国内青年人的街头流行文化，它起源于国外时尚杂志，这些时尚杂志除了及时介绍各大秀场上的新装发布，还要传递来自民间的流行信息，于是原本居于室内的大秀场与街头秀渐趋融合，“街拍”应运而生。随着“街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城市所接受，它不再独属于时装周，而是普遍存在于生活之中。“街拍”的

作者简介：刘娜（1991年11-），女，甘肃省酒泉艺术职业高级中学，传媒教研组组长；研究方向：影视传播、视觉文化研究。

主要对象是穿戴各类服装和饰品的青年男女，通过摄影的方式将整体的搭配作为一种流行符号进行传播，这使之成为“时尚传播”的研究对象之一。

时尚风潮最早由“有闲阶级”所倡导，其阶级属性和审美趣味通过华丽服饰或精美的器具得以彰显，而平民阶层则对这种品味的不断追逐中建构自我，以“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为参照，设置自己的人生性与奋斗目标。在普遍的社会效仿之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时尚神话趋向自然化，得以持存。回看历史，十八世纪的法国宫廷作为最早的时尚发源地，引领了欧洲时尚二百年。最初的高级时装即以欧洲皇室和贵族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珍贵的材料、精致的款式和高级工匠限量定制的稀缺性制造“时尚”的光晕，高端的品质、精湛的工艺搭配极富艺术性的创作使穿衣者如在云端，被赋予“神性”的想象，隐喻“时尚”的可望而不可及，其身份和社会地位自然得以彰显。

随着时代变迁，虽然对于时尚的阐释权几经下降至上流社会和明星群体手中，但始终没能成为人人拥有的一种文化和权利。进入当代社会，平民阶层逐渐萌发了自我读解“时尚”的文化意识，并对“有闲阶级”的时尚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结构性再造，“街拍”开始出现。正如齐美尔所言，“时尚创造于社会顶层，然后如水般渗透、滴流到各个社会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海诺因时尚”表明由上而下的传播已经动摇，许多创新产生于下层阶级”^[7]。通过对时尚杂志和互联网平台刊登的街拍作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街拍作品洋溢着平民阶层趣味，他（她）们的服饰不是高级定制，配饰也并非来自奢侈品牌，但却演绎着强烈的个人风格。至此，时尚文化阐释权似乎流转至平民阶层手中。

时尚阐释权的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认为这种流动的驱动力在于新媒体，正是媒介环境的变迁加速了平民“时尚”时代的到来。^[8]当今新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座架，构成了人类持存的图底，结构性再造了社会秩序和规则。新媒体技术赋予普通民众以发声的权利，使得平民阶层基于其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生成的穿搭和审美趣味在当今时代有了被“看见”的可能，进而推动了“街拍”的兴起。不可否认，新媒体在推动“街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如果以此为根本原因，尚无法解释为何“有闲阶级”与“平民阶层”的审美和对“时尚”的理解之间会存在差异，又为何新媒体推动的是时尚阐释权的逆转，而非进一步趋同？“街拍”这一从诞生之日起即打上平民标签的文化现象，其出现和发展无法完全归因于媒介技术。而应看

到，“时尚”作为一种视觉权利引发了“平民阶层”与“有闲阶级”的文化争斗，从而开辟了“街拍”萌芽的土壤。

如前所述，在“时尚”诞生之初，其阐释权把持在“有闲阶级”手中，他们通过华丽的服饰为“时尚”赋魅，彰显自我。但这种“时尚”是平民阶层根本无法企及的，平民不够“时尚”，并不能归因于审美能力，而是由于两个阶层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在这样的“时尚”体系中，平民的审美欲求和对“时尚感”的追求是被普遍压抑的，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压抑与抵抗往往对立统一，正是在对“有闲阶级”时尚的抵抗中，牛仔裤、工装风、马丁靴、oversize等原本从平民阶层日常劳动中生长出来的服饰逐渐流行，并在“街拍”中大放异彩。近年来，在“带货”直播中价格相对低廉的护肤品、装饰品受到更多青睐，独立设计的小众品牌服饰受到消费者热逐，这一风潮说明，“时尚”被重新定义，而这些饰品和服装又往往通过“街拍”被呈现出来，强化了公众对“新时尚”的认知。由此，围绕“街拍”发生的逻辑展现在我们眼前，即在自上而下的“时尚”传播中，“平民阶层”进行了对抗式解码，有力解构了“有闲阶级”的时尚观，并在对抗中推动与自我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服饰成为“时尚”之物；而“街拍”即为这一文化争斗下的必然结果。

三、审美博弈：作为隐喻的女性身体

无论古今中外，女性皆被当作主要的观看对象，在当今视觉消费时代，依旧如此。纵观各类“街拍”作品，无论拍摄的主体是影视明星还是平民阶层，女性都构成了被拍摄的主体。女性成为被观看的对象有多种原因，一方面，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拥有柔和的身体曲线、温柔的整体气质，更容易带给观看者美的享受，早期欧洲画家也因此多选取女性模特来进行绘画训练。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存世作品不过七十余幅，但是以女性为主体的画作却有四十余幅之多，其中《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还被评为“北方的蒙娜丽莎”，对少女柔美形象的刻画是这幅画作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思想被包容和接受，女性不再作为沉默的多数，其独立意识被唤醒，积极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展演女性魅力。而女性独立意识的传达与魅力的展现则需借助媒介，“时尚街拍”便作为一个女性展演的平台出现，并不断发展。这种独立意识和女性魅力通过“街拍”的中介而外化为视觉艺术作品，二次传播后又给予更多女性以精神鼓励，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唤醒女性群体：要勇敢、独立、自信而美丽的生活。

但在独立意识萌发之前，女性群体一度在男性目光的凝视中被压抑，进而被建构为男权世界的附庸。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对“凝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即通过凝视，“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持久的、洞察一切的监视“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肌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保持着警觉”，^[9]由此形成庞大的权力网络，女性身处其中无处可逃。具体来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女性的服饰讲究将身体包裹严密，不能将皮肤示于外人。穿衣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受到男性的凝视，目光所及之处即权力掌控之域，在男性的目光中女性的审美认知得以建构。这种“凝视”的逻辑是将女性身体视作其丈夫的私产，宣示了独家支配权，女性只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

进入到现代社会，虽然一波又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为现代女性争取到了个人自由，但传统的男性“凝视”仍隐秘留存，绵延至今。当今“街拍”作品中，有相当比例的被拍摄者都是穿着性感的女性，拍摄和观看图片的背后掺杂着比审美需求更为复杂的心理，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欲望，女性身体被重新建构为偷窥的对象。正如穆尔维（Laura Mulvey）所言“女性在社会中被议论，被观看，女性的角色一直站在性的风口浪尖，无论哪一个电影或书籍，必定有女性与性的内容。”在对男性“偷窥”的反抗中，一种“中性风”的女性穿衣风格和妆容风格悄然兴起，蔚然成风。在当今的“街拍”作品中，穿着趋向男性的女性时常出现，抑或身着女性西装，服饰剪裁得当，传达出现代职场女性的干练之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街拍”在当下悄然构成了“两性”博弈的场域，正是在双方的文化争斗中，“街拍”的内容趋向丰富。而“街拍”中女性形象的多元化也表征了女性在今天的文化解放。

四、结语：自由光晕的消散

通过上述分析，“街拍”兴起的深层动因清晰展现出来。第一，“平民阶层”在对“有闲阶级”消费品味的抵抗中，对“时尚”作出不同阐释，时尚阐释权逐渐流转至“平民阶层”手中，因而天然带有平民色彩的“街

拍”艺术开始萌芽。第二，展演在时尚街拍中的女性身体构成了两性审美趣味博弈的场域，表征着女性身体的文化解放，在两性的文化争斗中“街拍”兴起。质言之，“对抗式解码”贯穿了“时尚街拍”发生的逻辑，并构成了其不断发展的深层动因。

但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这种基于抵抗生成的自由光晕在闪耀不久后，便被资本迅速收编，一种新的时尚神话再度降临。具体来看，从“平民阶层”日常生活中生成的时尚之物——工装裤、牛仔装、破洞服，作为解构主流的自由符号而被资本再生产，成为奢侈品牌的时装，为自由标上了昂贵的价码。同时，亦须反思，大量女性模特愿意身着较少衣料的服装出境的原因。在当下，流量意味着经济收入，这些女性在眼球经济的逻辑下被资本巧妙收编，成为网站和自媒体平台收割流量的工具。在资本对“时尚街拍”的新一轮围猎中，自由的光晕最终黯淡，终将消散。

参考文献：

- [1] 费雯俪, 童兵. 跨界与融合: 时尚传播学科建设刍议[J]. 新闻记者, 2021(02): 60-68.
- [2] 陈贞旭. 后现代的狂欢——新传播环境中街拍现象的视觉文化解读[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5): 117-119.
- [3] 韩天越. 街拍盛行原因及其社会功能研究[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 15-26.
- [4] 李琦, 杨时梅. 时尚·亚文化·奇观——对“街拍”现象的文化解读[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0(02): 122-127.
- [5] 刘海龙.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71-280.
- [6] 罗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45-358.
- [7] 齐奥尔格·齐美尔. 时尚的哲学[M]. 费勇等,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72.
- [8] 邓楚怡. 消费文化与视觉文化下的时尚街拍分析[D]. 北京服装学院, 2019: 25.
- [9] [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240-243.